

中国

哲学

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E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人民出版社

河汾道统

常裕著

——河东学派考论

本书由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出版资金资助

HEFEN DAOTONG

河汾道统

常裕 著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I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
河东学派考论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常裕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01-007667-6

I. 河… II. 常… III. 理学—研究—中国—隋唐时代~明代
IV. B241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1761 号

河 汾 道 统

HE FEN DAO TONG

——河东学派考论

常 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667-6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方克立

亡友刘文英教授临走前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他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带完。这个博士生就是常裕同志。

为了全力照顾病中的刘老师，常裕在一年多时间里放下自己的学业，为挽救老师的生命做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师生情谊十分难得，其行为令人感动。我满口答应了文英的嘱托，让他放心而去。

在最后一年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常裕也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强烈的事业心，愿意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也有不为前人的先见所囿、敢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创新精神。他做的题目是《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重点研究在儒学重心南移后人们关注较少的北方理学的发展，以明初河东学派为中心，并追溯“河汾道统”之传承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这个课题不仅对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儒学史中若干关键环节的认识和评价，我认为是很值得做的。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历史上，黄河以东山西境内（特别是晋南）又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先民们在这里生长繁衍，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民族文化。

序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考古发现古代的“夏墟”就在山西的夏县和平陆，传说禹都于夏县西北。此后，历代多把这里当做地方治所，是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历史上这个地区也鸿儒辈出，学术传统深厚，并有多种宗教和学术文化交流融会、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儒、释、道三家的互融互通不仅表现在有关文献记载中，而且在山西的历史遗迹中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比如在悬空寺中就有“三神殿”，里面同时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三位圣祖，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情怀和开放性品格。

河东之学在中国哲学史、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河东学派哲学思想的形成和传承发展上。从历史渊源来说，提出“三教可一”的隋朝大儒王通和主张“统合儒释”的唐代哲学家、文学家柳宗元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明代河东学派是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心人物是学宗朱子而又促成了明初理学转向的薛瑄。河东后学即薛氏之再传和三传弟子在思想上分化之轨迹，也顺应了明代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常裕将河东学派研究的主题确定为薛瑄哲学思想评价和明初理学的转向，并附论“河汾道统”问题，应该说是抓住了关节点的。这两个问题在学术史上都有争议，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考释和深入的思想分析，力图对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若能达此目的，此项研究的意义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薛瑄是明代北方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明代著名学者高攀

龙在比较(河东)薛瑄之学与(姚江)阳明之学的不同时指出,他们“俱是大儒,薛瑄之学严密而无流弊,阳明之学未免稍有放松处。究其原因,薛瑄之学病于实,阳明之学病于虚。只是实病易消,虚病难补”。因此,朱熹之后,高攀龙只佩服薛瑄之学。

然而薛瑄及河东学派在后世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关系甚大。黄宗羲认为:“河东之学,恂恂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这一评价是有偏失的,未能摆脱王学的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于王之徒外示排击而中从调护。”黄宗羲师事明末王学大师刘宗周,其说多本于“师说”。刘宗周就曾批评薛瑄“多困于流俗”,“先生于道,于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黄宗羲受其影响较深,故在学术上表现出尊王抑薛的倾向是不足为奇的。《明儒学案》从篇卷编排到文字内容都是以王学为中心,诚如梁启超所言:“《明儒学案》,实不啻王氏学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先河;后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与裔;其并时者,或相发明(如甘泉之类),或相非难(如整庵之类),而其中心点则王学也。”

本书作者指出,站在王学门户之见的立场上,对薛瑄的河东之学作出“多困于流俗”、“恂恂无华,恪守宋人矩矱”的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在他看来,薛瑄恰恰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不是“恪守宋人矩矱”,而是对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批判和改造,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开明初理学转向之端绪。薛瑄学宗朱子,但并不盲从朱子。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他批评了朱子“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理气观,得出了“理气无先后”、“理气不相离”的结论,揭露了朱子哲学的内

在矛盾,促进了朱子哲学的分化。他在朱子理气二元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吸取了其“以气为本”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张载“太虚即气”的理论,得出了“统天地万物,一气之变化”的结论,直接影响和促进了罗钦顺、王廷相等人气本论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明代初期的理学大师,在阐发和实践“性理”方面,薛瑄自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认为千古圣贤修己教人之根本就是“复性”二字。薛氏“复性”论的特点是夹“理气”以论“心性”,有将“心性”实体化的倾向,从而否定了其超越的形上存在意义,而赋予它更多的作为“识心”的认识论意义。如果说理学中有理性主义思想,应该说它是经过薛瑄等人而得到发展的,这也是薛瑄对理学的一个重要修正和发展,对后来罗钦顺、王夫之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心”的操守和“敬”的功夫,薛瑄主张维护朱子的“心学”,但他所说的“心学”是“虚其心”、“存其心”、“专一意志以穷理”的意思,而不同于“心即理”、“心体即性”的心本论。这样,薛瑄就明确地强调了认识的主体性,把朱子哲学向“心学”方向实即将其向客观化的方向推进了。

薛瑄在明初首先倡导“务实理”、“求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以“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著称于世,被时人誉为“笃实践履之学”。如果说薛瑄的“复性”说是寻求理之“所当然”,是侧重于“求善”,那么他的实学理论则是寻求理之“所以然”,是侧重于“求真”。薛瑄强调外在的认识,而不是自我直觉、自我体验和自我超越,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可以说,薛瑄的实学理论和实践,促进了明清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形成。

正是由于薛瑄有上述思想转向,才使得北方“关学”得以中兴。明代冯从吾编撰的《关学编》,把薛敬之、吕柟等人看做是张

载关学的承继者,实际上,薛敬之、吕柟等人皆出于河东学派,而与张载并无师承关系。之所以被称为“关学”,除了由于薛敬之等人多为关中人氏外,主要是因为河东学派在思想上着力融合张载与朱熹,修正了程朱的“理本论”,在本体论上更接近于张载的“气本论”;在心性论上又特别强调躬行践履和人伦日用功夫,注重上学下达,提倡笃实践履的朴实学风,这些思想特点与张载所开创的关学学风比较接近,故为关中学者所认同和提倡。其实,冯从吾《关学编》所列明代 15 人,其中有 9 人为河东学派,5 人为三原学派。按照“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的说法,三原学派也是河东学派的支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无矜奇吊诡之习。”由此可见,明代关中之学,包括三原学派“皆自河东来”,其学风也与河东学派一样“崇尚气节,不为空谈”。明代关学的中兴正是河东学派的思想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真实写照。

薛瑄及其河东学派不仅在北方地区有较大影响,而且其弟子遍布秦、楚、吴、越大地,仅《河津县志》开列的河东弟子及从游者就有七十多人。由薛瑄开启的明初理学的转向,至其后学的思想分化和多元化发展就看得更清楚了。除了一部分与关学合流并向实学化方向发展之外,也有一些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传承薛瑄的心性修养学说时,由躬行践履之“下学”而转向静坐涵养的“上达”,表现出调和朱陆、折衷儒佛的特点,用吕柟弟子杨天游的话来说就是:“静坐者,或流于禅定;操存者,或误于调息;主敬者,或妄以为惺惺;格物穷理者,或自溺于圆觉;存心养性者,或陷于即心见性。”事实上在河东后学中也出现了或投身于北方王门、或列名于甘泉学派的情况。这些都说明河东学派并非简单地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恪守宋人矩矱”,而是创造性地开启并顺应了明初理

学转向的必然趋势。

关于薛瑄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清代学者孙奇逢、魏裔介等人都把他列入儒家道统的传承谱系就可以看得出来。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魏裔介著《孝经注义》,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 26 人列入其传道系统,用以说明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知道,能被列为儒家圣圣相传的“道”之直接传人在思想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里引发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曾被列入儒家道统的河东学者还不止薛瑄一人,在他之前,早已有人把隋朝的王通也列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传人之一,并有相传千年的“河汾道统”之说。这个问题后来成为思想史上一桩颇有争议的公案,本书作者也试图对此给予一个比较客观且有充分史实根据的回答。

关于“河汾道统”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对王通著作《中说》之真伪而引起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激烈批评说:“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觐,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事迹矣。”此语一出,竟使相传千年的“河汾道统”之说在责伪声中湮没,对王通思想的研究亦裹足不前,直到今人尹协理、魏明著《王通论》为之钩沉,事实真相才大体上得以揭明,但梁启超之说在学界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儒家道统之说是韩愈在《原道》中最先明确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用儒家的先王之道来对抗“老与佛之道”。在他看来，儒家先王之道的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的仁义学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将儒家圣圣相传的道统概括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6个字，并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为孟子之后道统的隔世传人。他同时对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等人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有所评说，特别是对王通在《中说》中继承发挥《中庸》的思想，将儒家之道概括为一个“中”字极为赞赏，认为“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萇、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显然，朱熹在“十六字心传”中所揭明的“允执厥中”之道，与王通在《中说》中所阐明的“大哉，惟变所适，惟义所在”的“中”道是完全一致的。

王通虽然没有明确讲过“道统”问题，但是他在儒学衰微之时，力倡恢复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以周孔之传人自居，有着高度自觉的弘道意识，因此后世才有“河汾道统”之说。唐末皮日休在讲到儒家道统的传道谱系时说：“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他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韩愈为儒家的传道系统。宋初的柳开也对儒家的传道系统作过论述，他说：“昔先师夫子，大圣人。……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孟轲氏出

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圣人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汉。天知其是也，再生扬雄氏以正之，圣人之道复明焉。……扬雄氏没，佛于魏、隋之间，论乱纷纷，……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辟，圣人之道复大明于唐焉。”他是以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为传道世系。不论是皮日休还是柳开，他们所认定的“道统”中都包括王通。另外，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也认为，尧舜之道就是经过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五人而传下来的。宋代哲学家邵雍、程颐、叶适、陈亮、陆九渊等人都对王通的学问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讲道河汾，培养了大批有王佐之才的高弟，为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程颐认为王通的学问在荀子、扬雄之上，薛瑄则把王通比做河东的“伊川子”。明嘉靖九年，经给事中张九功和大学士张璁提议，后由礼部裁定，把王通增入从祀孔庙之列，从祀的次序是：“董仲舒、后苍、杜之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王通入祀孔庙，说明他的儒学思想及其所开创的“河汾道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种历史地位和影响绝不是一句“虚构伪事”所能简单地否定掉的。

本书作者不仅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了“河汾道统”的存在及其千年影响之不可磨灭，有力地回应了梁启超的“虚构”说，而且指出王通的道统观是建立在肯定“三教可一”，即以“中道”思想来对待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相对开放的弘道观念基础上的，而不同于韩愈的那种企图通过排斥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来确立自家正统地位的十分褊狭的道统论。就这一点而言，王通实为宋明理学吸纳佛道思想、推进儒学的综合创新开了先河。应该说，作者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大势的这一观察和评论是冷静理

智的。

河东地区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王通、司马光、薛瑄等人从祀孔庙,他们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都是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照理说应该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格外重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无论是河东学派还是“河汾道统”,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否认与学术史上两桩著名的公案也有很大关系。一篇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竟然向黄宗羲、梁启超两位学术史权威发起挑战,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开辟河东之学研究的新局面。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这件事情在中国思想史、儒学史和地域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文英兄当年支持常裕做这个题目,自然也包含着他对北方理学发展的关注在内。作者论文的完成和出版也是对先师最好的纪念。当然,关于薛瑄哲学思想和明初理学转向的研究还需要深入,特别是河东后学思想分化所反映的时代思潮嬗变的轨迹,更是需要通过翔实的资料和细致的思想梳理辨析去加以具体阐明,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希望作者利用回晋工作的有利条件,将此一课题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

2008年1月10日

目 录

序	方克立(1)
导 论	(1)
第一节 解题:关于“河东学派”	(1)
一、“河东学派”释义	(2)
二、“河汾道统”钩沉	(5)
第二节 问题:“河东之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10)
一、研究现状	(10)
二、存在问题	(13)
第三节 主题:“河东学派”研究的主要问题	(14)
一、薛瑄的哲学思想	(14)
二、明初理学的转向	(17)
三、“河汾道统”的地位	(19)
第四节 转向:河东后学的发展演变	(22)
第五节 定位:如何评价薛瑄及“河东学派”	(25)
第一章 河东学派的地域渊源	(30)
第一节 王通哲学思想对河东学派思想的影响	(30)
一、王通其人其事	(30)

二、王通的哲学思想	(33)
三、王通对河汾地域文化的影响	(43)
第二节 柳宗元哲学思想对河东学派思想的影响	(45)
一、统合儒释	(47)
二、天人关系	(53)
三、大中之道	(57)
第三节 王通“中说”与柳宗元“大中之道”及其 对河东学派的影响	(60)
第二章 河东学派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渊源	(64)
第一节 明初调和朱陆思想及其理论转向	(64)
一、相争与相融	(64)
二、实体化与去实体化	(66)
第二节 曹端哲学对河东学派的影响	(74)
一、曹端的哲学思想	(75)
二、曹端哲学思想对河东学派的影响	(83)
第三节 明代河东学派的形成	(88)
一、河东学派兴起的社会原因	(88)
二、北方河东学派的兴起	(100)
第四节 河东学派是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107)
一、元代理学发展的趋势	(108)
二、明代初期理学的发展趋势	(113)
第五节 河东学派并非“恪守宋人矩矱”	(116)
一、从《明儒学案》看“河东之学”	(117)
二、从薛瑄思想看“河东之学”	(121)

第三章 薛瑄及其哲学思想(上)	(124)
第一节 薛瑄简介	(124)
第二节 薛瑄师承考	(129)
第三节 薛瑄的主要哲学思想	(135)
一、理气观	(135)
二、复性说	(152)
三、实学观及其对明清实学的推动	(177)
第四章 薛瑄及其哲学思想(下)	(190)
第一节 薛瑄的人生修养与境界追求	(190)
一、薛瑄的“诚”、“敬”修养思想	(190)
二、薛瑄的“性天通”理想境界	(205)
第二节 薛瑄的政治哲学思想	(216)
一、论“清廉”	(217)
二、论“勤政”	(221)
第三节 薛瑄的教育思想	(225)
一、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225)
二、为师之道的论述	(228)
三、为学方法的阐释	(231)
四、现代教育的启示	(233)
第五章 薛瑄之后河东学派的发展	(236)
第一节 薛瑄之后河东学派师传考	(237)
第二节 河东学派的传承与变化——关中诸儒	(245)
一、王恕的“诚敬”实学思想	(245)

二、薛敬之“心以气动”的理学思想	(247)
三、吕柟“性气相即”的理学思想	(250)
四、关中诸儒的思想分化	(256)
第三节 心性实体化倾向及其嬗变	(259)
第六章 薛瑄及河东学派在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266)
第一节 薛瑄对朱子学的发展	(267)
第二节 薛瑄对心性学的修正	(273)
第三节 薛瑄与关学中兴	(286)
第四节 河东学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296)
余 论 关于“河汾道统”说	(308)
第一节 “河汾道统”说的提出	(310)
第二节 “河汾道统”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315)
第三节 “河汾道统”在儒家道统中的影响	(320)
主要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32)

导 论

第一节 解题：关于“河东学派”

“河东”是指黄河以东地区，秦时即置河东郡：“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左传纪事本末》卷八）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古代传说和记载中可考的部落大部分在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因为这里土地肥沃，古人利用它富庶的经济条件从事文化的发展，自然所获得的成就要超过其他地域。《史记·五帝本纪》在黄帝之后列有颛顼、帝喾和尧、舜，说是黄帝的后裔，黄河岸边都有他们的足迹，所以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说。西周时期的夏墟就是山西的夏县和平陆，传说禹都于安邑，安邑即今之夏县西北。自秦置郡以后，历代都作为地方治所。唐贞观年间所置十道，即有“河东”道；宋代设路，亦有“河东”路；元代则称之为“腹里”，明清时改为“山西”行省，并沿用至今。

从历史上看，河东地域文化连绵，人才不断，历代不乏大家，有着良好的地域发展传统。隋朝王通曾设教于河汾，其所授弟子千余人，后以“河汾”指代王通及其学术流派，明代高启作《追挽恭孝先生》诗曰“关洛遗风在，河汾旧业传。”清代钱谦益亦在《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中称：“其名汰学者于涑水、新安，奉为丹书，